

哲人其萎，泰山其頽

——緬懷呂叔湘老人

馮瑞生
語文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呂叔湘老人在長期住院後，終因心力衰竭而瞑然歸去。一代宗師溘然長逝，在語言學界產生了不小的震動。呂叔湘先生享年九十有四，應該算壽終正寢，其逝也應在情理中，但不拘怎樣說，一代學者遽歸道山，語言學界從此失去了一個精神支柱，漢語言文字領域從此失去了一位大師級學者的護持，這一現實的確是人們所不願意接受的。整個語言學界顯出了某種失落與無奈。陳寅恪先生的去世，中國再不會有陳寅恪了；同樣，呂叔湘先生的去世，中國也再不會有呂叔湘了。因為這不是一個出大師的時代！

四月二十日，北京西郊八寶山追悼儀式上，全國各地千多人在肅穆的氣氛和哀樂聲中列隊進入靈堂，向躺在花叢和輓幛間的呂叔湘先生遺體告別。這一千多人的大多數是頭髮或兩鬢斑白的學人，也即五、六十歲上下的教師和語文工作者，他們的心中恐怕正在經受着「泰山其頽」的現實以及對學界未來前途的某種迷惘。靈堂內排滿了花圈，靈堂外掛滿了輓聯，沒有微風，顯得靜謐而凝重。啟功先生的輓聯是：

探語法辨修辭先路關蠶叢業廣千秋尊碩學
培國本育英才豐功垂禹甸輝騰四裔仰宗師

張中行先生的輓聯是：

德風赫奕語類指迷舉世永懷朱仲晦
音學輝煌日知糾謬令人長憶顧亭林

四川大學張永言先生與呂叔老有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災難過後，呂叔老極為關心蜀中張永言，特請人訪求之，其知遇之恩使人如沐春風。故張永言先生也有輓聯遙寄：

早沐西潤風滋音旨親承語史研探期我切
遽驚山頽梁壞儀形已杳執業無成負翁多

呂叔湘先生出生於一九〇四年江蘇省丹陽縣一個書香世家，幼承庭訓，秉賦極高，故二十二歲即畢業於當時著名學府南京東南大學外國語文系。少年時本名「鍾湘」，因在呂氏家譜中屬「鍾」字輩。上學時只單名呂湘，無字，以名行。早期發表文章大多署名即為「呂湘」。參加社會工作後，感到只有名而無字，諸多不便，（舊時代人際之間交往或社會活動中，往往有不便於稱名的情況，講究禮數則應稱人之字。）於是再發表作品時在姓名間加一「叔」字算是有了「字」了，以後竟以字行，「呂叔湘」三字漸漸為人所熟知。本世紀四十年代前後的出版物中還可以探尋到「呂湘」到「呂叔湘」的痕迹，五十年代以後就再不見單名「呂湘」了。

「叔」蓋伯仲叔季之叔，是排行第三之謂。前面二位兄長似也值得一提。大兄呂瀟（1886-1956），字鳳子，以字行，是我國近代最早的美術教育家，其親創之江蘇美專，在我國美術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次兄呂澂（1896-1989），字秋逸，佛學大家，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先生之接班人。早在一九六一年，受中國科學院學部委托舉辦佛學研究班，其講稿即後來中華書局所刊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最早的一部佛學專著，影響及於今。呂叔老晚年亦常憶及兩位兄長，手足情篤，令人感沛，而呂氏一門三兄弟之傑出特立於學術界，實不多見。

呂叔湘先生早年曾在故鄉丹陽縣中學和蘇州中學教書，一九三六年考取江蘇省公費赴英倫留學，先後就讀於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和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科。一九三八年回國後，曾任教於雲南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及中央大學，在開明書店從事編輯工作則已是四十年代末的事了。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所任研究員，後改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曾任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間擔任《中國語文》雜誌主編。一九八〇年中國語言學會在武昌成立，被選為會長，同年美國語言學會授予名譽會員稱號，一九八七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一九八〇年以後還應邀擔任語文出版社社長，這應該是呂叔老生前最後一項公職。他在一九八五年曾鄭重表示，既答應擔任這一職務，就絕不掛名（因為有不少頭銜與職務多為虛銜，並未真正投入），他要把這作為語文學界的事業實幹下去。以後語文出版社的每年出版選題計劃，他都要親自過目，一一評估並詳細了解每位作者的情況，給編輯部同仁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五年以後，我開始在語文出版社編輯部任職，當時《漢語大字典》編審工作已全部結束，上方以此而仍將我作為辭書編輯安排，於是，這期間深得呂叔老的教誨多多，至今銘記，不敢稍忘。一九八八年，我曾策劃「斷代語言詞典」工程，以《先秦語言詞典》為開頭，然後是兩漢，魏晉南北朝……對這一選題策劃到底有多大可行性？實際並未作深刻的論證。從好的方面看，是我個人想做出些成績，為辭書編纂領域積累成果；從不好的方面看，則有貪大求全、急功近利之嫌。一九九一年歲末，在國家語

委高級職稱評審會上，呂叔老慎重地提出「斷代語言詞典」的策劃不切實際，難以奏效。其中特別提到《先秦語言詞典》，不知到底怎麼個編法？並具體講到，眼下凡出版了的先秦文獻典籍，都不會是白文，一定有注釋。讀者完全可以憑借這些注解閱讀古書。對於先秦文獻的研究成就最高的仍然是乾嘉學者們，你的《先秦語言詞典》能夠超過乾嘉學者嗎？那些沒有注解的古籍必定是乾嘉學者都沒能解決的難點，你們是否就可以解決？如果你們無法解決，如果你們沒能突破乾嘉學者的範圍，那你們又何須勞神費力編這麼一部先秦詞典！

呂叔老的話無異給我潑了一盆涼水，思想上雖未想通，但也莫可奈何，「斷代語言詞典」的策劃也就只好煞車。《先秦語言詞典》因已上馬，仍堅持下去，只是迄今已十餘春秋而無所成，箇中緣由，誠如呂叔老所預言，在學術上無法突破前人窠臼，且無新義，又何必虛耗人力財力去製造這些「文化垃圾」呢！那次職稱評審會之後，呂叔老托人帶信給我，約我去他家面談。呂老大約以為我一時想不明白，擔心我接受不了他的中肯意見而影響情緒。作為編輯的我，呂老既是領導，又是學界前輩，在他老人家面前，我是虛心誠懇而且認真聽取教導的。那次「談心」大約有兩小時。他從國外編纂辭典的情況談起，尤其給我介紹了英語的斷代語言詞典的編寫歷史，相形之下，對我們目前的學術水準和敬業精神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他還回顧了當初開明書店的情況，特別提到，單就校對一班人而言，葉聖老的夫人領銜擔當校對，那是甚麼樣的水平！現在的編輯恐怕也難比得上那時的校對，那種對眼下學術界、出版界狀況的憂心忡忡，可以說貫穿了他整個晚年。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國語言學會在武昌成立，呂叔老當選為會長，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閉幕大會最後的致辭中，他說：「在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方面，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軍中，語言學不僅有用武之地，還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對語言的研究並不是已經很深入了，相反地，還需要加倍努力去工作。對圍繞語言學本身形成起來的應用學科和邊緣學科的研究，也是有更多的工作等待我們去做……我們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而我們的隊伍還很薄弱，可供利用的圖書資料也不完備，情報工作也還不能適應研究工作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語言工作者必須付出加倍艱苦辛勤的勞動才能為語言科學的發展作出較大的貢獻。」語重而心長，反映出他對這一學科情況的了解程度。記得他還引用了劉備的話「勿以善小而不為」，並大力讚揚王力先生既要雕龍，又要雕蟲的精神。這也許是呂老晚年寫大量的小文章為報刊文字指瑕的思想基礎吧！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一則新華社電訊《人大常委會17次會議閉幕》，電文有一段：「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共二十一條，自公佈之日起實施，它將適應於中國同外國締結的雙邊和多邊條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協定性質的文件。」

呂叔老指出電文中的「適應」顯然是「適用」之誤，並分析可能是誤解詞義，也可能是在作者的方言裏「應」和「用」發音相同或相近。因之他將這歸入「忙中有誤」一類，「如果寫完了電訊稿再看一遍，就可能發現錯誤，即時改正。新聞記者常常會因為爭取早發稿，不肯寫完之後再看一遍，這是很不妥的，有時候會造成不僅僅是文字上的錯誤。」（以上見《未晚齋語文漫談》48-50頁）整體的文化素質在滑坡，大師級的學者又能怎樣？

如果說擔任語文出版社社長是呂叔老生前最後一項公職，那麼出任《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首席學術顧問則應當是他生前最後一件實事了。說「實事」，是因為仍然不是虛銜，有他的話為證：「我這些年多病，精力不濟，對詞典工作出力不多，除經常聽他們匯報，問問情況，出點主意外，參加過幾次編寫工作會議，不免也說過一些過去編寫詞典的經驗教訓，對他們的工作可能有一些借鑑參考作用。」（見《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序言》）呂老的話說得再謙讓，我們也能從中體察出他的實際投入，遺憾的是這部規範詞典尚未完工，（現在僅刊出的規範詞典的字頭部分另行編成的《現代漢語規範字典》）他老人家已不可能親見了。哲人其萎，泰山其頽，在緬懷和遙祭之餘，我們真切企盼着，語文學界能有一個新的學術繁榮期的到來，庶幾可以告慰呂叔老的在天之靈。



1995年呂先生與夫人程玉振女士攝於香山公園。（李行健教授提供）